



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讲话,后被收录到《周恩来选集》下卷中。周恩来在讲话中明确提出:“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他分析了我国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具体要求,探讨了我国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存在的有利条件,指出了我国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对于新形势下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中国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具体要求

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中国过去科学技术很差,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是基于当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战略思考。

在周恩来看来,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相应的政策。他指出,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必须遵循“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和“相互促进、迎头赶上”的要求。其中,“实事求是、循序渐进”是指要有科学的态度,要尊重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国情,“相互促进、迎头赶上”是指要有雄心壮志,要有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心和信心。

周恩来还分析了“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和“相互促进、迎头赶上”之间的内在关系。他指出,在顺序上,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是“同时并进,相互促进”的现代化,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在这方面,中国虽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可以利用一些有利条件,比如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利用世界上最新的科技成果,这样中国在社会主义



□ 王凤青

科学技术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

——读周恩来《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就可以扩大眼界,前进的步伐就“可以加快”。另外,周恩来基于他长期以来的实践经验,指出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会一点弯路不走”,但“可以少走弯路”,中国“应该迎头赶上,也可以赶上”,中国不应该也不必“跟在别人后面把所有的程序都走一遍”,那样的话,中国“将永远落在后面”。他认为,只要把“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和“相互促进、迎头赶上”统一起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就能够适应中国的实际和国情,就能够“比较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存在有利条件

周恩来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虽然落后,但由于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作为指导,可以帮助国人更好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发挥主观能动性,因此,中国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存在很多有利条件,只要把这些条件运用好,群策群力,自力更生,中国就一定能够后来居上,做出超过前人的贡献。

第一,“有广大的人力和丰富的资源做基础”。对于这个问题,周恩来从两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对祖国、对人类应该做出较大的贡献”。二是在历史上,中华民族的祖先有过许多发明,“后来居上,我们是应该超过自己的祖先的”。

第二,“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做保证”。周恩来指出,在旧社会,一些科学家赤手空拳,单枪匹马,还能做出一些贡献;在新社会,社会制度有了根本变化,生产力解放了,人们思想解放了,单枪匹马变成了群策群

力,科学家有了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广大自由天地,应该而且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他同时指出,科学家要做出更大贡献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把集体需要与个人自由辩证结合起来,需要一个实践和认识的过程。

第三,中国已经“有了一支比旧中国大许多倍的知识分子队伍和科学技术力量”。周恩来指出,中国自清末开始就派人出国留学,到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共有20多万大学生;新中国成立后到1962年,自己培养了96万大学毕业生和几百万中级知识分子;再过10年,中国又会有100多万大学毕业生。这些人是“国家的宝贝”,是“旧时代所不能比拟的”,为中国科学技术现代化奠定了人才基础。

第四,中国已经“有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周恩来认为,一般设备和原材料的绝大部分,中国自己已经能够制造或生产,这为中国科学技术的

发展“创造了条件”。

多措并举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要求

周恩来认为,中国要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除了利用好已有的有利条件外,关键在于切实采取多种措施,把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

一是“加强科技界人士的主人翁责任感”。具体而言,就是科技工作者要自觉“做到接受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自愿地坚持自我改造”。科技工作者应该“做到老、学到老”,要认识到自己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改造,“有了缺点就改,就会进步”。

二是要“集中和加强科学技术力量”。周恩来认为,科学研究部门、教育部门和工厂要密切结合,既要有分

工也要有合作,而不是把力量全部集中在科学研究部门,也不是全部集中在教育部门或工厂。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合力,推动科技力量更加集中、高效利用。

三是改进各方面关系。周恩来指出,要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必须处理好各方面关系。首先是正确处理党群关系。他认为,党群关系首先要融洽,当然青老关系、师徒关系也要融洽。其次是处理好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领导主要是集体领导,不是讲党员个人,党员个人在适当情况下可以有一点个性。最后是要正确处理理论和实践、任务和学科的关系,以真正实现领导、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科学研究机关、学校和生产部门的紧密协作。

四是“适当改善科学技术研究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在改善工作条件方面,周恩来指出,国家相关部门要给科技人员提供便利,比如设备可以适当进口,原材料、图书、报刊等要相互支援,图书资料该订阅的要订阅。在改善工作环境方面,周恩来认为,虽然科学家在生活方面要求不高,但他们的生活问题、居住问题“不能完全不考虑”,该提供便利的、能够提供便利的要提供便利。他认为,只要条件有利,科学家“就能创造出新的成绩来”。

周恩来关于“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论断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综合考量中国国情和基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战略思考之后得出的正确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更加需要把科技强国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重温周恩来的这篇重要讲话,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郑玄的治学之道

□ 刘余莉

经学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大凡治经之人,几乎无人未曾读过郑玄的注解。郑玄(127—200年),字康成。他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遍注群经,尤以《三礼注》成就最高,为东汉经学的集大成者。唐朝贞观年间,郑玄被列于二十二“先师”之列,配享孔庙。清朝顾炎武在《述古诗》中称赞他说:“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该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礼存,其学非小补。”相较而言,郑玄的治学经历却不似其注解那样人尽皆知。事实上,正是因为郑玄一生坚守淡泊明志、潜心经教的治学态度,成就了他在经学史上的卓越成就。

少年立志,专注经学

郑玄年少时,做过乡啬夫,即执掌听讼、收赋税的小吏。但是他不愿为吏,常求教于学官。郑玄从少年时代就确立了学习经学的志向,终日沉浸于书卷之中,孜孜以求。他不尚虚荣,天性务实。在十一二岁时,他曾随母亲到外祖母家做客。当时客人很多,在座的十几位客人个个衣着华美、夸夸其谈,显得既有权位、又有气派。唯有郑玄默默坐在一旁,似乎身份和才学都不如人。母亲看到,感到面上无光,于是就暗暗督促他要出头露面,显示一点才华和神气。但郑玄却不以为然,说这些庸俗的场面“非我所志,不在所愿也”。

后来,郑玄到洛阳上大学,学通了《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后来又跟从东郡的张恭祖学了《周易》《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等。之后他又去扶风向马融求教。在马融门下的前3年,都是由马融的高徒来传授他,未曾见过马融的面。但是他仍日夜钻研,不曾倦怠。后来马融听说他善于

算术和天文,才见了面。从此以后,他开始有机会向马融当面求教。

郑玄在马融的门下7年,一心研读经典。马融的性格放达,“不拘儒者之节”。他“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在前面教授门徒,帐后设置了女乐。其他弟子在上课时都免不了偷看这些女子,唯有郑玄目不转睛,专心于学业。由此可见,郑玄的定力非同一般。马融从这里看出,他日后必有所成。郑玄学成走后,马融多次对弟子们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意思是说:郑玄这位学生离开以后,我的学问也就会被他带到东方而发扬光大了。

守节不仕,宁静致远

郑玄游学十几年回到家乡,已有学生近千人。后来因为党争,他被禁锢达14年之久。他趁此正好杜门不出,专修经业。到汉灵帝末年,才解除了党禁。

大将军何进听说郑玄是一位贤人,于是派人前去征召他,希望他做官。因为何进极有权势,州郡的长官都不敢违抗他的意旨,于是就胁迫郑玄。郑玄迫于无奈就去拜访何进。何进很尊重他,为他准备了坐几和手杖,对他礼遇有加。但是郑玄并不接受何进所赐予的朝服,只是头戴幅巾去面见何进,而且住了一宿就逃奔而去。

当时大将军袁绍在冀州统领军队,也派使者去邀请郑玄,并且以盛大的规模招待宾客。郑玄最后一个到达,袁绍请他上座。当时宾客中有很多才俊之士,既有辩才,又有学问,见到郑玄是儒者,并不认为他是一个“通人”,即学识渊博的通达之人,竟相起身向他提问发难。郑玄都依据儒家经典进行申辩应答,而且每一次回答都大大超出了问题本身的范围,讲说了很多这些人从未听过的言论,结果座中之人,没有不赞叹心服的。

当时汝南的应劭也归顺了袁绍,向郑玄自我引荐说:“我是前泰山郡太守应中远,想做您的学生,您看如何?”前太守主动请求拜师,一般人会感到很荣光,甚至受宠若惊。但郑玄听后却笑着说:“仲尼之门以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考察弟子,没有听说颜渊、子贡这些人,是以官职自称的。”应劭听后,脸上露出惭愧之色。

袁绍举荐郑玄为“茂才”,并且上表推荐他任左中郎将,但是郑玄也都没有接受。公车署征召他任大司农,赐给他一辆四马安车。凡他所经过的地方,所有的郡县都要派长吏接送,排场十足。但是到朝廷之后,郑玄就以生病为由回家去了。

当时,正好袁绍和曹操在官渡僵持不下,袁绍让儿子袁潭派遣使者,逼迫郑玄随从军队。郑玄迫于无奈,就带病来到了元城县,因为病情危重而无法继续行进。这一年他不幸病逝,时年74岁。郑玄留下遗嘱要求薄葬。从郡守以下曾经跟随他学习的人中,披麻戴孝来参加丧礼的有1000多人。

遍注群经,潜心教育

郑玄晚年写信给他的儿子,提到他的志向是“整百家之不齐”,并自称“颇有让爵之高”。他无心于功名利禄,一心系念的是为众说纷纭的经典给出一个好的注解。所以,他所注的《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等,都非常著名。

郑玄注经,一反当时繁琐之风,力求简洁明快,凡是文义清晰明白之处,都不进行注解,而在经义晦涩难懂的地方着力。所以他对《礼记》很多篇的注释,字数反而少于经文。例如,他对《乐记》的注释,一共5533个字,而《乐记》的经文是6459个

字;对《祭法》的注解,只有5409个字,而《祭法》的经文是7182个字。

郑玄以他深厚的学养,遍注群经。范晔在《后汉书》中称赞他“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他在注经的过程中,把所有重要经典都囊括无遗,参考了众家的注解,删裁了繁琐、没有证据的内容,校勘改正了遗漏、错误之处。从此以后,学者们再学这些经典,无不参考郑玄的注解。

此外,他还著有《天文七政论》《鲁礼谥议》《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百余万字的著作。他的学生将他平日问答弟子的对话,编成了《郑志》8篇。《郑志》的体裁像《论语》,由此可知,他的教学是效法孔子,采取了问答启发的方法。

郑玄从事教育工作20余年,提出了一些教育观点。例如,他认为,初学要从近者、小者学起,并且要十分重视德行教育。对于道德教育,他提倡要注重“身教”和“力行”,而且对家庭教育也特别重视。他在晚年写信提醒儿子:“勤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并且要求家人“菲饮食,薄衣服”,坚持节俭。

郑玄的注解之所以能够成为权威注解并流传后代经久不衰,与他所采取的注经方法以及他在经典和教学上所下的功夫密切相关。特别是他淡泊明志,潜心经教,“板凳须做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治学态度,使其终在经学史上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于当代学人树立良好的学风、文风仍深具启发意义。



用典释义

不情者,众善之师也。

【讲话原文】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不情者,众善之师也。”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培育形成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1月24日)

【出处】

抱朴子曰:坚志者,功名之主也;不情者,众善之师也。登山不以艰险而止,则必臻乎峻岭矣;积善不以穷否而怨,则必永其令问矣。

——(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广譬》

【解读】

《抱朴子》是东晋学者葛洪(自号抱朴子)的道家理论著作,由《内篇》和《外篇》组成。《内篇》今存20篇,论述神仙、炼丹、符篆等事,多属于道家;《外篇》今存50篇,论述时政,臧否人事,多属于儒家。

在《外篇·广譬》中,葛洪提出:“坚志者,功名之主也;不情者,众善之师也。登山不以艰险而止,则必臻乎峻岭矣;积善不以穷否而怨,则必永其令问矣。”意思是意志坚定,是建功立业的主导;勤奋不息,是一切善行的老师。登山不因为艰难险阻而停止,就一定会到达顶峰;行善不因为自身穷困与否而埋怨,就一定会使自己的美誉长久。用登山作譬,指出意志坚定和勤奋不息是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自古就明白,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起步之年。开启新征程,扬帆再出发。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的宏伟蓝图,我们必须同时间赛跑、同历史并进,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唱响新时代奋斗者之歌。

(赵雁丽 杨立新)